

读书

D

U

S

H

U

2011

上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读书

2011

1

January

G226
46

2011(1)

U S H U

中华女子学院
图书馆
藏书章

张 鸣 革命：摇晃的中国

杨念群 “英雄史观”的回归？

陈 珏等 高罗佩诞辰百年

季进、余夏云 妖娆的罪衍，负面的现代

方维规 《剥洋葱》与文学自述的困境

唐晓峰 北京的存在

中华女子学院



0432918

选择

陈四益文
黄永厚图



北京人艺上演了一出小剧场话剧。没有剧名，请观众代为起名。很有点特别。剧作者郭启宏，是一位多产剧作家。他的多幕剧《李白》和写顾贞观、吴兆骞故事的《知己》，都有很好的反响。这出戏根据一篇美国小说改编的，形式和以往不同，细论情节，就说来太长了。

故事发生在一座小镇。剧中两个插曲给人印象很深：一位教师对孩子说：“我给大家讲一个《小妈妈找蝌蚪》的故事好吗？”孩子们异口同声说：“好——”只有一个孩子举起了小手：“我想听闹海哪吒的故事。”老师叫他坐下，好好想想再回答。第二次问，孩子仍想听别的故事，老师厉声喝他站起，又叫他坐下再想。到了第三次，孩子无言，他知道没有也不允许另外的选择。于是老师说：

“好，没有不同意见。”另一个插曲发生在小酒馆。这家酒馆只有一种酒，叫“玉钩藤”。但每次客人要酒，老板都要问：“你要什么酒？”绿豆烧、糯米酿、竹叶青，三番几次遭拒，客人终于明白：“那就玉钩藤吧”。老板充分满足了顾客选择的权利。

两个插曲，事涉荒诞。但次日翻阅报纸，令我意外。说是某地政府网站一项民意调查，只有两个选项：满意和非常满意。结果自然如永厚先生所言，满意度创吉尼斯新纪录。县政府说，这是网站遭到黑客攻击的结果。这就使事情变得更加诡异，似乎那小镇的故事就发生在身边。

忽然又想起剧中一句台词：有备选而叫人家选，这是尊重，没有备选而叫人家选，这叫侮辱。



- 张 鸣 革命：摇晃的中国 辛亥百年3
- 杨念群 “英雄史观”的回归?11
- 吴重庆 从熟人社会到“无主体
熟人社会” 田野札记19
- 谢广宽 冯友兰视域中的大学与学术独立26
- 高罗佩诞辰100周年35
- 陈 珏 从《高罗佩》到《高罗佩》
- 李 零 《高罗佩》与《高罗佩》
- 沈 冬 《高罗佩》的研究
- 王邦维 高罗佩与“悉县”
- 李泽厚、刘绪源 “情本体”是一种世界性视角 ...51
- 阎克文 从主观意义到人的意义 著译者言62
- 孙传钊 从斯图尔特·休斯说到彼特·盖伊69
- 王辉云 马丁·路德·金81
- 罗 丰 那一代人的心迹89
- 彭自强 环境成就人，也成就书101

短长书110

西泠独坐记(韩水法)·走出身体之后(李锐)·《庄子·德充符》最后两段文字归属问题探讨(陈怡)·揽彼造化力,持为我神通(彭国翔)

王 尧 我们的故事是什么 剑桥笔记121

季进、余夏云 妖娆的罪衍,负面的现代126

方维规 《剥洋葱》与文学自述的困境136

唐晓峰 北京的存在141

陈平原 另一种“双城记”

李 皖 民歌嘹亮(一九五七——一九六六)

——“六十年三地歌”之二(李) 著有心 ...155

读书平台164

韬光养晦,怎样英译?(冯世则)·小堀远州与茶具的世界(李榕青)

赵汀阳 漫画34

陈四益 黄永厚 画说封二

辛亥革命是近代史学界的一个大题目，在我的记忆中，每逢五逢十的纪念，史学界总会开一个规模很大的学术讨论会，出若干册讨论文集。但是，这个大题目，却不见得因此做得特别好，总有些问题，海峡两岸都拎不清。近代晚近一点的历史表明，在某种程度上，辛亥革命，已经成为一个符号性的事件，怎么研究，都难以逾越符号划定的雷池半步。

过去研究革命或者起义，尤其是改朝换代成功了的革命和起义，大抵有个套路，无非是被推翻的王朝腐败透顶，社会动荡，民不聊生，民变蜂起。然后有人振臂一呼，群起响应。但是，辛亥革命前夕的清朝，其实不是这样。记得史学界曾经按照过去的套路，根据档案统计过辛亥前夕民变的资料，发现辛亥革命前一年，全国民变可统计的大约有一万起，规模都不大。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么点“民变”，委实算不上什么民变蜂起，更休谈天下大乱。朝廷新政引起的反抗，居然少得出奇，连废科举这样的大事，竟然也波澜不惊。谙熟中国政治的《泰晤士报》驻中国记者莫里循为此十分兴奋，由此预言中国的改革会十分顺利。当年的所谓民变，除了土匪和会党的扰乱之外，真正民间的骚动，主要集中在丈量土地和清查户口上，至于地方自治和教育改革，基本上没有什么反弹。被后人渲染的“烧学堂，打先生”的运动，其实只是山西少数地区干草会搅和出的小骚乱，只能算是茶杯里的风暴。

只要摸过辛亥前后的社会史料，会发现，其实辛亥年之前中国社会相当安定。跟此前相比，很多过去匪患严重的县的知县有了自己掌握的武装，用洋枪装备起来的“小队子”，剿匪的能力大幅度提高。同时，由于地方自治的开展，乡镇一级有了乡绅主导的自治机构，过去县里管不过来的轻微的治安案件，也得到治理。很多绿林好汉，盐枭土匪，比如广西的陆

荣廷，奉天的张作霖，扬州一带的徐宝山，都接受了招安，然后卖力地为政府剿灭从前的同道，成绩斐然。因此，辛亥前的匪患，比之新政之前，整体上是在减弱。

如果说，那个时代有主旋律的话，新政时期的主旋律是立宪。不仅原来的维新党人呼吁，地方士绅响应，连朝中的大臣，分量最重的袁世凯和张之洞，都主张立宪，满臣中的佼佼者，端方、那桐和良弼，都是立宪的热心人。在日俄战争的刺激下，最终朝廷也答应了立宪，而且在九年预备立宪期间，真抓实干地做了准备，各省选举了咨议局，朝中有了资政院。后来有人比较了资政院和民国后的两届议会，发现就数资政院的议员水准高，议政水平也高。清朝最后几年地方士绅的立宪请愿，声势浩大（就缩短预备期而言，其实也不是没有成绩）。可是，除了立宪之外，这个国家还有其他的声音，这就是革命。孙中山的革命党，在辛亥前，没有成气候。只能算是“星星之火”。革命对清朝最大的威胁，是一九一〇年汪精卫刺杀摄政王，此番暗杀，接近成功，如果一旦真的成功，其影响力其实比所有的起义加起来都大。相比较而言，革命党人的宣传，对中国后来的进程影响还要大些。当时的这种宣传，主要是排满，强调满人对汉人的二百多年的虐待，尤其是清初满人入关时对汉人的屠杀，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应该说，在这样一个变革的关头，这样的民族主义宣传，对于清统治者而言，的确消解了其统治的合法性，使其操作的空间变小，让他们只能做好，不能做坏，一旦犯错，就可能引发汉人士绅“非我族类”的联想。

可惜，立宪的主旋律，在一九〇八年光绪和西太后两个成熟的政治家死后，在当家的满人少年亲贵手里，最终变调了。这些年纪不过三十岁的年轻人（摄政王载沣当家时二十五岁），少不更事，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从来没有到底层历练过，但却一下子当了这么大的一个国家的家，想不犯错很难，而且一犯，就是要命的错。错在抓权，把权抓在自己手里。把汉人手里的权力收归满人，把散在地方的权力收归中央。然而，

清末政治格局，满轻汉重，内轻外重，已非一日，满人政治能力又大幅度退化，如此收权，谈何容易？搞皇族内阁，有计划地换掉汉人官僚，甚至把地方的路矿权也收回中央，就过于赤裸裸了。要知道，在立宪的主旋律里，除了少数前维新党人，绝大多数士绅，其实并不真的明白什么叫立宪，无非是想通过立宪，跟中央政府分享权力，主要是行政权力。结果分享不成，自己有的，反而要失掉，失给强势的西太后也就罢了，失给几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让人如何能咽下这口气？就这样，主旋律哑了，其他的声音就占了上风。

即便如此，如果没有几个偶然因素，革命也未必能成功，至少不一定在辛亥年的武汉取得成功。其一，如果当时的湖广总督不是瑞澂，而是一个能干的汉人，起义未必能成事。那天晚上，炮一响瑞澂就挖开后花园钻了狗洞，溜到“楚豫号”兵舰上，摆出一个随时要跑的架势。事后起义的士兵都说，群龙无首的他们，未必能撑得下去，那些没响应起义的团队，有了主心骨，没准会倒向那边。毕竟，当时绝大部分军官和一半以上的团队，都没有响应起义。其二，如果武汉的革命党人孙武他们没有在俄租界试验炸弹失败，而是按部就班地策动起义，起义也未见得会成功。此前半个月，武汉新军个别士兵就像武昌起义那样，也开枪闹了一场，但没什么人响应。但俄租界的爆炸，革命党人把武器、金钱连同旗帜和大印，甚至是党人花名册都丢给了清政府，而瑞澂又处置失当，既不是马上按图索骥大搜捕，也不是当众把花名册烧了，而是破获了几个据点，杀了三个人，把人头挂在城墙上示众。花名册上有谁，士兵们心里根本没底。当时的革命党，没有那么严密的组织，也没有什么严格的入党手续。于是谣言四起，人人都说，瑞澂马上要按名册大搜捕，大开杀戒。所以，尽管群龙无首，但在等死亦死，起事亦死的情景中，人们当然会倾向起事。第三个偶然因素，是由于武汉这个地方，恰好钱多，枪也多。起义成功的士兵们，发现藩库和铜元局里居然有四千万元的巨款。在当年，一

家六口，六元一个月就能活得很好，四千万的确是一笔巨大的财产。加上自张之洞以来，武汉购买的枪械，以及汉阳兵工厂的枪械堆积如山。有了钱和枪，革命军马上就扩军。革命前湖北只一镇（师）一协（旅），一万多兵力，当时在武汉的不足万人，参加革命的，也就三千左右。革命军招兵，每月关饷十元，立刻就招满了五个协，相当于两个半师，原来的起义士兵，此时都做了军官。从前孙中山不喜欢在武汉发动起义，其中一个理由就是武汉是个四战之地，就算起义成功，在四面围攻下，也容易失败。但是，一听说革命党有了五个协，周围的省份立刻就有自身难保的感觉（周边的几个省，都只有一协新军），即使中央政府，也得耗费时日，调集超过五个协的军队，才敢进剿。这就给了革命一个机会，一个巩固和发展的机会，在没有大的战事的半个月里，好些省份都动了起来，纷纷独立。等到北洋军在冯国璋的率领下攻下武汉三镇中的两镇，那边南京则被革命党克复，清朝大势已去。其实，革命军的五个协不足为惧，因为都是新兵，好多人连枪都没摸过，头上还留着辫子，那些由士兵转成的军官，也没有指挥打仗的经验。但是，当时全国的新军包括北洋军，都没有经过战争，对于打仗，只会计算兵力和武器，五个协横空出世，没法让人不害怕。

当然，真正让起义成功，而且遍地开花的关键性因素，还是立宪派的配合。武昌起义第二天，局势完全没有明朗之时，湖北省咨议局的议长汤化龙就来了，不仅来了，而且欣然“从逆”。作为一个中过进士、在日本留过学的大士绅，这样的选择，让人感到有点不可思议。不仅他麾下的汉口商团投奔了新政府，帮助维持秩序，而且他还派人说服了在武汉的西方领事，同意把革命党和清朝列为同等的交战双方。更重要的是，他通过他的弟弟，前来镇压起义的海军大臣萨镇冰的副官汤芑铭，游说海军保持中立，后来在萨镇冰走后，海军居然整个舰队反正，令前来镇压的北洋军很是丧气。不久，在湖南的起义中，议长谭延闿，一个高官后人、湖南破天荒的科门高第也“从逆”

了。再后来，名绅张謇、汤寿潜，江苏巡抚程德全，上海的商会几乎全都上了造反的“贼船”，除了陕西等少数几个地方之外，各地的独立，都有立宪派或者当地士绅相当大的份额，很多地方，所谓的独立干脆就是士绅包办的（尽管这些事例往往被后来的史学家批评为革命不彻底，但在当时，革命党人其实也很欢迎这样的独立）。立宪派对于满人亲贵的收权行为实在太恼火，革命党的宣传，此时大大听得入耳了。让他们放火自然也难，但有人放火，他们是敢于煽风添柴的。

被满人亲贵深深伤透心的袁世凯，当然没有太多的心情去力挽狂澜，挽救这个风雨飘摇的王朝，他可不是崇尚理学的曾国藩。事实上，他就是有这个心，也挽救不了，不仅天下乱了，人心也乱了。当时，一些人热切地急于在中国的国门上挂上共和招牌，就如名记者黄远生说的那样，好像民主共和的招牌只要一挂出来，就会像魔棒一点，让中国变一个模样。但另外一些人却依然觉得，像中国这样的国家，立宪是必要的，但还是要要有皇帝为好。持这种看法的人，不仅有一部分的士绅，还有外国人。对待这场突如其来的革命，西方列强其实也没有思想准备。日本人一度倾向于干涉，但一方面没有准备好，一方面由于其他列强都不同意，因此没有下手。在华的外国人，多半倾向革命，觉得中国实现共和不错，但在华的外交官可不这么看。在华势力最大的日本和英国外交官，开始是致力于保全清朝皇室，让他们作为一个虚位的元首存在。其实，袁世凯也一直是这样打算的，并非是后人眼里的“曹操”。在南北谈判中，好长时间都在坚持君主立宪，而其中的君，是满人皇室。尽管在这个过程中摄政王退了位，皇族内阁也被取消，但是，犯了大错的清朝皇室，还是无法维持，至少没有办法作为国家元首来维持。维持满人皇帝做元首，独立各省不仅革命党不能容忍，连立宪派也不能同意。作为统治者的满人，在革命当口的表现也实在不怎么样，各地驻防旗营，除了西安，基本上没有抵抗，尽管装备精良，但他们却没有用精良的武器哪怕放上一枪。各地满人官僚，除了个别有自尽的外，其余都

学了瑞澂，走为上。满人政治，自打清朝中叶以来，多少年都是一潭死水，不温不火也不作为，经过二百六十年的养尊处优，满人整体上的确腐化了。加上最后几年的倒行逆施，实在让人难以同情。即使中国人需要，但现成的满人皇帝，却做不下去。

坚持认为中国应该有皇帝的人们，包括外国政府和他们的使节，又开始讨论别的方案。方案之一，是从明朝皇族嫡系中找人来做皇帝。然而，这个方案一经提出，荒诞也就随之而来了。因为所谓朱明嫡系已经无从谈起，不知道会有多少野心家会找出多少个朱明三太子、四太子的后人出来，根本无从辨别真伪，而且任何一个朱明后人上台，都不会有人服气。民间传说此番革命，就是反清复明，也许少数会党人士会认账，但革命党则根本没这个意思。这个方案不行，第二个方案又出来了，说是把在曲阜的孔圣人后代衍圣公请出来做皇帝。第一脉络清晰，衍圣公就是孔门嫡系，第二德高望重，至少人家祖宗让人服气。但是，这样做麻烦也多，首先孔圣人从来都是素王，历代都没有人做过真皇帝，现在出来，有违圣人传统。其次，衍圣公似乎也没这个意思出来趟浑水，做一个空头皇帝。当然，更重要的是，当时很多人，尤其是站在时代前列的人，觉得既然革命了，君主立宪已死，试一试最先进的制度，未尝不可。当年对西方的崇拜，主要是制度的迷信，这个迷信，有着严复介绍进来风靡天下的进化论作为思想基础，相当的牢固。

所以，在人们的制度迷信，或者说幻觉中，袁世凯做了中国第一、世界第二华盛顿。最先进的制度，在中国挂牌了。挂牌之后大家才发现，其实没了皇帝的中国，还真的不好治理。虽然总体上革命大体平和，战事只发生在少数地区，但革命后的秩序，却不那么好了。没有皇帝，就没有王法，居然成为很多农民对于革命的基本认识。至于那些会党、土匪、盐枭更是趁机猖狂，大肆活动。

民国办不好，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建立一个基于新制度的秩序，这个秩序，是民众最需要的。即使像袁世凯那样的强人，在内忧外患之下，

在秩序建设上也举步维艰。最后居然出了称帝的下策，给了反对他的势力一个最好的借口。他的观察没有什么错，的确中国人缺乏公共意识，共和没有基础。但是，革命已经发生了，共和已经建立了，如果退回去，就证明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不适合中国。

辛亥革命给中国带来了共和制度，尽管这个制度跟君主立宪都属于代议制，但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却有先进和落后的分别。君不见，在康有为模仿公羊三世说建构的制度递进模式里，君主立宪是小康，而民主共和才是大同。但是，革命给了中国一个最先进的制度，却并没有像教科书里说的那样，使得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也许，革命之后，中国西学东渐和西俗东来的过程，被加速了。中国社会，旧的伦理因为君主的消失而陷于崩解，但新的伦理和新的信仰，却因为启蒙的缺失没有建立起来。奇怪的是，原本在清朝新政时期遍地开花的启蒙运动，到了革命之后，反而消沉，白话报和俗话报一个个销声匿迹，原本遍布沿海地方乡镇的阅报亭也不见了，甚至，连盛行一时的文明戏，也让位给了京戏的复兴。启蒙实际上被很多东西压倒，救亡仅仅是压倒它的最后一根稻草。这场革命给中国带来了制度变革，但也带来了制度的焦虑和变革的焦虑。革命没有带来预期的变化，但却只能在进一步的革命中解决困境，思想革命，伦理革命，政治革命，越来越激进，似乎激进才能解决问题。新制度没有应有的光环，但却只能在更先进的制度变革中寻找答案。君主没有了，但比君主还有威权的领袖，却普遍地受到知识界和民众的欢迎，卡利斯马型的魅力领袖，成为人们普遍的追寻目标。与此相应，自由主义者则变成了中国命运最尴尬的群体，里外不是人。国共两党，只要有可能，都在拼命营造领袖个人崇拜的氛围。皇帝不可再现，但神王却出世了。

辛亥革命，将近一百年来都是一种符号，一种推翻两千年帝制，建设民主共和的符号。这种符号，赋予了这场革命绝对的正当性，即使后来的研究，也只能顺着歌颂的路子进行。最可能的反思，就是所谓的革命不彻

底性，而这种所谓的反思，在我看来，本身就是这场革命的后遗症。革命的发生，对中国而言，实际上是一种命运的无奈，谁叫西方把中国拖入它们的世界体系的时候，中国恰好是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呢？而赶上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之时，这个政权的统治集团，又已经严重退化。中国顺利转型的砝码，都压在这个政权不犯错误上，事实上是一个不可能的幻觉。只要他们犯了错误，皇室的位置保不住，君主立宪也就没戏了。一个有着漫长帝制历史的东方大国，原本必须有的、作为虚位君主的稳定象征一旦没有了，建立新制度下的新秩序，就难上加难了。没有君主，呼唤出来的替代，就只能是比君主更霸道的领袖和救世主，有了这种领袖，国家和社会才能安定下来。可是一旦领袖出了问题，国家和社会就出了大问题。

自打一八六〇年，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中国被拖入西方世界体系之后，中国的历史就离不开世界史了。中国近代史的种种别扭和扞格，都是一个古老帝国被嵌入西方世界体系的别扭和扞格。辛亥革命，从某种意义上也是世界史的一部分，从此，东方诞生了一个年轻的共和国，但古老的帝国，却阴魂难散。西方的历史，左右着中国，但又左右不了。革命之后，中国没法按自己的逻辑走，也没法按西方的逻辑走，因为二十世纪的西方，已经不是一个西方了。此后，无论怎样学，怎样走，中国只能貌似地学习西方，貌似地走自己的路，做成一个非驴非马之局。

一个事件，过去了一百年，是到了该好好反思的时候了，这个事件，不应该再是抽象的符号了。

《与祖师同行》 明一 著 定价：29.80元

得预临济宗法脉的禅宗法师邀你神游祖师路，体证生活禅。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新刊

谁也难以否认，“英雄史观”近些年衰败得如此厉害，在“社会史”和“新文化史”两面夹击的强势围剿下，几乎变得人人可诛。然遥想当年，“英雄”一直占据中国主流史学的中心位置。政治史的主角无疑是“帝王将相”，或是帝王将相的变种：那些“起义领袖”或“革命首领”。即使是官方理念主导下的“民众史”，也书写的是“变态”的英雄史，何出此言？君不见，主流史学一直打着民众推动历史进步的旗号展开叙述，但民众的现身往往不是在躬耕陇亩甚至也不是在啸聚山林之时，而是在揭竿而起席卷蔓延成所谓“农民起义”之后。虽然群氓造反，多不成事，但其统领除因殉道被剿杀之外往往是最大获利者，常常能登堂入室，成为改朝换代的“英雄”，他们的名字刻满了历史的花名册，民众最终还是难免沦落为“历史的失踪者”。故打着“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招牌的各类历史书写，都可以看做变相的“英雄史观”。或许可称之为一种“伪民众史”。主流史学中的“人民大众”还极易为“变态”历史观中的许多神话表述所绑架，比如夸张地说他们能左右历史的“规律”“趋势”“进步”云云。

不得不承认，旧式“英雄史观”是极力要求删除历史发生的各种“常态”的，常见的例子是每隔几年史学界就要热闹一回，缘由是要纪念某个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多少周年，或庆贺某个重要历史人物的诞辰。“纪念史学”的规模如仪式似赶集，每逢集日，各色人等纷纷登场，痛说英雄创造历史的业绩，人们也经由此等“赶集”获取合法从事历史研究的通行证。不过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还真出现一拨儿不想赶这趟集的异类，就他们而言，对“常态”历史的成功关注成为分散抵抗主流叙事的一种最佳策略。在他们眼中，普通人生活中的家长里短，甚至构不成任何“事

件”要素的某种“集体无意识”都能成为核心话题。更别说村庄里一个老农貌似平庸的私生活，甚至吃喝的种类成分、居所的位置朝向，乞佛拜香的灵签、黄大仙意识流似的“胡言乱语”，庙碑里的隐语秘言，都是他们穷搜极索的对象。对“日常生活史”的关注催生了人类学与中国历史学的结缘，也开启了“英雄史观”落寞的序幕。

人类学渗透进历史学直接诱发了具有中国特色之“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在我看来，推说中国地域辽阔，不可能一下子做出整体概括，而非得做切片式研究的看法，不过是历史研究转向底层的一个极其表面的理由。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结盟均首先发生在东南地区是有其更深层原因的。东南沿海如广东、福建地区宗族网络发达，庙宇遗迹遍布且多保存良好，至今修谱拜神的风气鼎盛不衰，具有历史与当下的自然延续性则是个重要的地区性原因。出生于当地的人类学和历史学家熟悉本地语言习俗，又尽得近水楼台之便，使得“区域社会史”的兴起具有了鲜明的“在地化”特性。这倒不是说北方地区就不具人类学田野的特征，而是说人类学与历史学交汇集合后产生对话反应的要素更容易在东南沿海一带体现出来。其实，历史人类学所展现出的“在地化”特性与费孝通所说的“汉人人类学”的转型有关，由于观察对象被转移至文明程度较高的“汉人”社会，中国人类学的发展没有西方传统人类学检视异族文化时那般容易产生与“他者”的隔阂。我们会发现，历史人类学的触角基本不会延伸到西南非汉人聚居的民族地区，故与传统“民族学”的研究路径鲜明地区分开来。

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结缘彻底终结了“英雄史观”横行的历史，史学的首要任务似乎是观察民众“常态”下的日常生活，捕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以便区别于“英雄史观”对“变态”历史的支配性阐释。人类学对社会结构中各类“象征”符号意义的解读同样引发了“新文化史”探索微观物质生活的热流。新文化史渗透的范围已波及到气味和声音、阅读与收藏、空间与身体等等相互关联的层面。甚至“香水”的弥漫和“钟声”

的扩散这样难以捕捉的感觉都会被认真写成历史。不容置疑的是，“英雄”的落寞和消失也造成了一些问题，比如对日常生活细节的过度迷恋导致研究的“琐碎化”，缺少了“英雄”角色，人们不禁会问：历史大线索靠什么来编织呢？充满着民众无意识行为和细节的历史反而在走向上显得更加模糊不清，说严重甚至会使人们失去理解历史演变趋势的动力。区域化历史情形的细致深描能否替代整体历史的解释也是个未知数。最严重的问题可能是历史书写的“平庸化”，当早已习惯由“英雄”经验填充历史记忆的那些头脑，突然要适应阅读那些零碎不整的生活记录，还要努力说服自己承认其具有研究的合法性时，是需要相当大的心理承受力的。

王铭铭出生于泉州，按理来说其学术经历应该循序稳妥地步入人类学的典型“民族志”一脉。可泉州自古又是辐辏八方的世界级大港，来往多有东亚一带以及阿拉伯和内亚地区的商人，泉州文化包容开放的气质也许多少使王铭铭的思维受到感染，故其研究路数颇不安分寻轨，倒也好像少了某些汉人人类学学者有意无意表现出的“在地化”痕迹。除早期《社区的历程》和《闽台三村五论》外，王铭铭的心绪犹如泉州港里的大舶，漂浮不定，却总是连接着家乡以外的世界。从《逝去的繁荣》对泉州老城的考察到倡导“中间圈”即藏彝走廊历史的研究，都在反复印证他不安分的游走状态，隐隐昭示出一种不同于常规“在地化”的个性书写风格，以至于我们很难用“历史人类学”或“区域社会史”等熟识标签来规范他的思考。现在，王铭铭又开始倡导“人生史”的写作，这论题不但与渐具霸权特征的“区域社会史”主导研究取向渐行渐远，其大唱反调的举动难免易惹众怒，而且其选择犹如孤独远行的旅人，必须担当不确定的行程所带来的各种风险。

为什么要打出“人生史”的旗号呢？它与“新文化史”已经习惯使用的“生活史”表述到底区别在哪里呢？王铭铭的解释是“生活史”的对象相当于社会科学所规定的“群体”，它们在特定学科术语描述的“人生礼

仪”和“日常时间”中经历着历史流程。“人生史”的对象则是“非常人”的个体，比较接近古代史书中的“人物志”。对“普通人历史”的过度关注常常使我们对历史的认知极易陷入“民粹主义”的窘境。对民众日常生活观察的痴迷很容易连带着对其行为方式进行无原则的肯定。史学过度“民粹化”的后果可能会表现为两个极端：第一个极端是在民族主义或革命史的解释框架下对民众集体无意识暴力行为的合法化。比如在“农民起义史”框架内，太平军对江南一带文化的蹂躏践踏被解释为反抗清政府暴政所必然付出的代价；在“近代民族主义”叙事中，义和团虐杀教民的凶残也会被解释成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行动。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中国学者接受民族主义历史解释的过程，也就是树立民粹主义历史观的信仰过程。一旦树立此信仰，无论何种把“个体”融入“群体”的暴虐行为都因为是为历史必然性张目而自然而然变得合理合法。由此我们就可领会，曾一度热心鼓吹“新史学”，并把建构民族主义“国民史学”视为第一要义的任公，为什么到一九二二年以后思想会出现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闭口不提“进化”、“国民”等时髦字眼，而大谈似乎玄而又玄的“互缘”与“个人事功”？任公重拾“英雄史观”在那些奉行进化论史观的专家眼中，无疑是一种倒退！但对任公本人而言，转换另一个观察角度却无异于一次新生。

史学“民粹化”的另一个极端表现是，让过着平淡无奇生活的民众在特意设置的历史“常态”舞台上大唱主角。各类细碎庸常化的史实和描写，以及被重大历史事件所排斥的边缘角色及其活动，都被赋予了重要地位。其结果只能是，历史的演化主线被淹没，对庸常化史实的过度重视和描写必然带来史学思想的“平庸化”。王铭铭提出诊治史学庸常化的药方是回归“人生史”的写作。其目的是摆脱近代社会科学总是想把“人生”整合进民族国家秩序的僵化套路。从表面上看，这种整合趋向尊重“个体”价值，其实恰恰是想通过在关怀“个体”的语境中消灭“个体”，“个体”的个性一旦被削平，就恰似“庸人”猬集，最终促成结构对“个